

# 相向而行与知彼而行

## ——区域国别学学科之辩

姜景奎\*

笔者此文议论的主要是我国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即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问题。曾几何时，抑或是外交层面，抑或是智库层面，抑或是学者层面，“我们表示遗憾”是相关人士挂在嘴边的惯用语；但近年来，“相向而行”突然成为一个高频词，成为众所倾情的词汇。对此，笔者另有看法，认为相向而行不如知彼而行，知彼而行理应取代相向而行。

### 一、概念界定

关于相向而行，大家已耳熟能详。在个体层面，大致意思是：我这么做了，我认为对咱俩都有利，希望你也能这么做；也即，咱俩都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在国际层面，意思相近：我方这么做了，我方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利，希望你方也这么做，咱们双赢；多边也一样：我方这么做，希望大家都这么做，大家多赢、共赢。也就是说，某一方确信，相向而行是双赢、共赢的必要条件，希望另一方或另几方都做相向的事情。但是，果真如此吗？一方确信那么做会双赢或者多赢，另一方或另几方也会有同样认知吗？答案是不

---

\* 姜景奎，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确定的，甚至是否定的。因为，如果确是那样，当下世界就不会这么复杂多变。实际上，正是由于大家认知不一，才有了这多元多彩的世界，才有了这美好纷繁的地球；同时，也才出现了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出现了美西方的新冷战意识及实践，也才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局部战争。

笔者完全赞同并理解，主张相向而行者是善意的，其出发点是美好的，绝对没有否定多元的意思。不过，笔者仍然认为，单方面提出相向而行，或者单向坚持自己认为的相向而行是不合适的，也经常是行不通的。

知彼而行，意指我方这么做，同时知道对方大概会怎么做；或者说，我方对对方有相对深入的了解，知道对方的情况，对于对方怎么做，我方心中有数。双边层面如此，多边层面也一样。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面对某一事件，我方清楚对方的诉求，明白自己的某类表述或行为会引起对方的某些反应，或积极或消极，但仍然按照自身利益和相关认知坚持做或持续做下去，不会因为事前没有预料到对方的反应而中途停止或完全不做。可以说，知彼而行是在充分掌握对方情况下的主动行为，虽然希望受到对方或多方的接受并欢迎，但也不会因为对方或多方的反对或抗议而停止，在某种情境下甚至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偏执”行为。相反，相向而行是自己先做，再看对方的反应，并且希望甚至劝说对方做同样或相似的事情，这自然是被动的，颇具盲目性。在这种情境下，一方会苦口婆心，呼吁另一方或另多方以大局为重，以大家的共同利益为重，恳望另一方或另多方相向，以便实现自己认知的最好。可是，往往，呼吁方的大局并非被呼吁方的大局，呼吁方认为的共同利益并非被呼吁方的期许，被呼吁方常常不为呼吁方愿望所动，其结果自然不理想，甚至适得其反。

一句话，相向而行是盲目的被动期许，知彼而行是理性的主动行

为，二者存在本质不同，其结果自然也具有本质区别。

## 二、相向而行的被动

前文有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对外反应常常是除“很遗憾”之外再无其他，即使在国家重大权益遭受损害的时候也会如此，实例不一而足。原因自然在于我国彼时国弱民穷，难以与外部不友好势力对抗。遇到事情，抑或不利于本国利益，抑或不利于地区稳定，抑或不利于世界安全，只能表达没有实际意义的遗憾，无奈无力，口不从心。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中国GDP总量为日本的3倍有余，并超过欧盟各国GDP的总和。2013年以来，我国总体发展进入快车道，各方面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大增。由此，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也出于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我国陆续提出了利于全人类的倡议和理念，如“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外交“亲诚惠容”“亚洲文明互鉴”“亚非合作”等理念，希望世界各国能从全球视角和人类福祉出发，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共同繁荣。然而，尽管这些倡议和理念如此美好，我国也有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和实力乃至实践，但美西方及其追随者却见不得中国强大，反而制造矛盾，把矛头对准中国，坚持反华遏华，反对“一带一路”倡议者有之，不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者有之，不相信“亲诚惠容”“亚洲文明互鉴”者亦有之；不仅如此，美西方还变本加厉，一意孤行，积极倡导新冷战思维，出台了明确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对华不友好策略和机制，并企图以新冠疫情诬陷中国，炒作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甚至以俄乌战争牵制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损毁中国名声、损害中国利益。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国际局面下，我国希望合作，不希望对抗，希望各国能相



互尊重、相互成就；同时，我国依然继续努力，坚持改革开放。所以，我方在诸多场合呼吁相关国家“相向而行”，维护世界和平，合作共赢。自然，不少国家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愿意与中国发展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赞同“亲诚惠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积极促进亚洲文明互鉴和亚非合作。但正如前文所言，美西方及其追随者不仅无视我“相向而行”的呼吁，反而反其道而行之，表面道貌岸然，内里卑劣无赖，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口诛笔伐，污其名声，陷其不义，致使世界分裂，几近回到冷战时代。而由于冷兵器时代基本结束，当下局面甚至坏于冷战时代，使整个人类陷于危险之中。

何以至此？在笔者看来，美西方的固有成见及反华惯性自然是决定性因素，但我们的工作应该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和需要改进的空间。这便是笔者主张的“知彼而行”，即以“知彼而行”取代“相向而行”，或者先做到“知彼”，后做到“相知”，再争取“相向”。果真如此，我国的国际境况必有大改善，相关倡议和理念必会得到更多国际理解、国际支持和国际实践，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应该能够视地球为一个整体、视人类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应该能够一起共商共建共享，从而实现共同繁荣。

### 三、知彼而行的主动

何以知彼？这便涉及我国刚刚颁布的交叉学科目录下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

实际上，不论是相向而行，还是知彼而行，都已然成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必需。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叶，由于综合实力较弱，中国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一，既不需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保持联系，也没有能力与所有国家都发生关系。那个时候，抑或因为安全问题，抑或由于经济发展关系，中国只与部分国家保持紧密往来，

先是亚非拉国家，后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则不一样，中国已经是经济巨人，文化巨人的形象也在崛起，不仅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央，自身利益也已遍及全球，地球的东西南北中乃至天上地下，都有中国的利益所在。因此，我们在行动上主动实践，同时放弃了长时间内“表示遗憾”的惯用语，改为呼吁相关国家与我们“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地球、增进人类福祉。但是，我国在实践层面上“相向而行”的大声疾呼却遭遇了不少不合作、不配合、不理解，乃至反对、诬陷和对抗。于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途径，变被动为主动。恰逢其时，国家决定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这对于实行学科制的中国教育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更是为当下及未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协同合作提供思想、培养人才而做出的重大决策。笔者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恰是变被动的“相向而行”为主动的“知彼而行”的必需和必备，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被动何以成为主动？这关乎区域国别学的定位问题。笔者在《南亚学》第1辑的文章“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刍议”中有相关论述，此处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

第一，新学科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应是基于地域的领域之学。“地域”指地理，即相关区域和国别的地理位置及与该地理位置相关的内容；“领域”指学科，即具体研究涉及的知识内容，比如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政治经济，乃至山水资源等。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应重视基础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隐学，而非显学，是灯火阑珊处的学问，而非聚光灯下的高谈。有人会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相混淆，甚至还会扯上智库，这些都是误区。从根子上说，区域国别研究是基础研究，研究者得有坐“冷板凳”的恒心和毅力，否则出不了“活儿”。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应重视以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语言为基本工具的田野研究。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不太看重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语言，认为通用语言完全可以代替当地语言，如印度/南亚研究中的英



语、非洲研究中的法语等，这是出于现有文献资料的错觉。实际上，到南亚地区和非洲地区真正进行田野调研者绝对离不了当地语言，在印度调研，印地语必不可少；在斯里兰卡调研，僧伽罗语必不可少；在东非调研，斯瓦希里语必不可少。所以，真正的田野和从文献到文献的数据收集完全不一样，和短时间的访谈考察也不一样，是亲身体验式和全方位观察式的实地生活，而且这类田野工作需要一定的连续时长，一般不应少于一个自然年。体验式田野研究应该是新时代田野调查的最基本方法。

第四，区域国别研究是基于区域的国别研究，也是基于国别的区域研究，两者相互成就，不可分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门类，区域国别研究既不是单纯的区域研究，也不是单纯的国别研究，而是二者的结合和融会贯通。对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要在区域的宏观视野中研究具体国别，其前提在于，任何国别的行为和状况大多与本区域中的其他国别有着某种或紧密或松散的联系，这是一种联系的情境化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要在扎实的国别研究基础上考察区域，其前提在于，任何区域都不是抽象和悬浮的，而是由区域内诸国别的具体问题构成的，这是一种在地的微观的研究视角。

第五，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学科制，其首要目的是培养人才，因此新学科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高层次专才。当下不少高校赶着成立偏重智库研究的研究院和学院等机构与此似有相悖之嫌。培养人才是高校的初心和立身之本，咨政咨经是智库的初心和立身之本，二者有别，虽可兼具，但不可偏废。

第六，新学科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应具备全球视野、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产出这类“三视人才”应成为高校设置区域国别学专业的最重要目的和目标。所谓全球视野，即把整个地球当作一个生命体，把人类当作一个命运共同体，平等对待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族群，视发展生存权为人类最重要的权益，这恰与我国古代伟人提出的“大同”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理念相一致。所谓中国视域，即熟知中国历史，理解自身文化：首先，要深刻认知由东部和南部的农耕文化板块、北部的草原文化板块、西北部的沙漠戈壁文化板块以及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文化板块构成的中华文明体及四大文化板块之间的血肉联系，这四大板块是一而四、四而一的问题，不可单独视之；中国的“一”体现在整体之中，“多”体现在诸板块之中。其次，基于该“一”之下的“四”和“多”，要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比如诸板块的历史主体逐鹿中原及其在构建整体中华文明体过程中的作用，再比如诸板块不同族群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死嫁娶风俗的异同和包容，又比如具体的“土葬”“水葬”“天葬”“树葬”等丧仪及其背后的“入土为安”“入水为安”“升天为安”等理念。再次，要全面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演进历程，并与现实相联系，遥想历史，思考当下，坚信中华文化的传承信念，树立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加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意识理念。一句话，中国视域要求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人才具有中国情怀，自知自爱，热爱自然，爱好和平，爱国爱家。所谓对方视角，即能理解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深知其宗教伦理，清楚其社会政治，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对方，以对方的心理揣摩对方，知彼通彼。也就是说，“三视人才”是具备全球视野的知己知彼的全能型综合人才，是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变前述的相向而行为知彼而行、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因素，在与他方的交往中，应能赢得较为普遍的肯定和尊重，乃至向往和热爱。所以，新设立的区域国别学与当下的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有很大区别，该学科是一门交叉学科，更是一门跨专业学科，涵括文理医工农等各个学科的知识。

继续议论学科。在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学科已设的大背景下，大致说来，或不完全科学地看，各培养单位区域国别学专业强调的不应该是提供对策，那是智库的任务；不应该只是看向聚光灯，那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的任务；不应该只研究国别史或区



域史，那是历史学的任务。笔者喜欢以荷塘作比喻，即一国或一个地区相当于一个荷塘，有的人看重莲藕，有的人看重荷花，有的人看重荷叶，却很少有人看重水和泥。从某种角度说，莲藕、荷花、荷叶不是不值得研究，但水和泥才是真正值得重点研究的对象，因为其上决定荷花和荷叶，下决定莲藕，一旦地理位置得以确定，荷花、荷叶和莲藕的成色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水和泥。因此，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者来说，包含地域特征的水和泥最为重要，地域即地理，抑或热带，抑或温带，抑或寒带；水和泥则涉及学科和专业，文理医工农无所不包。研究水和泥者与研究莲花和莲藕者肯定有区别，正如前文所言，花和藕属于聚光灯之下的显学，看的人多，议论的人也多；水和泥是灯火阑珊处的隐学，看的人不多，研究的人也不多，而且得深入到水和泥中，观其色、闻其味、究其成分，得联系其上的荷花和荷叶，得顾及其下的莲藕，稍有不慎便会弄得一身泥水，甚至会呛水、会陷入泥泞，致自己于尴尬之境。但假以时日之后，由水和泥而成的荷花、荷叶及莲藕这类显性存在便会成为研究水和泥者自然延展的探究对象，这是一开始就研究荷花、荷叶及莲藕者完全做不到的。由此，研究水和泥者会对该荷塘有完全的认知，对其地理特征、其水质优劣、其土壤酸碱性、其与荷花荷叶莲藕的适配度有全面的考量，而后便可对症下药，以便有最好的回报。以印度研究为例，宗教文化是类似水和泥的存在，研究印度宗教，必然涉及其社会制度、族群关系和政治政党等，必然能够探知并理解其外交逻辑，从而触及影响中印关系的印度内质因素。

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即如上面的研究水和泥者，之于他们，对象国和对象地区就是上面的荷塘，他们关注的绝不是当地最显性的花和藕，而是花和藕赖以成为花和藕的水和泥。他们需要坐“冷板凳”，他们需要时间，他们需要深入当地，使用当地土语方言，进行长期近距离的实地观察体验，进行“细无声”的探究，而后得出结论，并与现实中的显性现象相联系，与我国的关切和对方的期许乃至



地区和全球的利益相联系，寻得大家的关注交集和长远利益。在此前提下，我方的言行必定会更加自如，不盲目、不冒进，就算与他方的期许不一致，由于出发点的公心及对自身关切的保障，相关行动也应是可持续的。举例说明，关于新疆问题，具备一定中国历史和相关区域知识者一定了解，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早于公元前二世纪始，前述的农耕板块、草原板块和沙漠戈壁板块就结合到了一处，成为中华文明体的共同构建者和组成者；而同时，今天的新疆地区与如今的域外相关国家或族群并无类似关联。关于西藏及相关地区归属问题，具有本地考古、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及印度宗教文化知识者一定知晓，早在二三世纪，中原政权与青藏高原上的阿里地区就建立起了某种相互认可的政治关系，当地王侯贵族坟墓中的绣有“王侯”字样的内地丝绸和茶叶及茶具就是阿里当政者认可中原正统和内地文化的某种佐证。这表明，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文化板块很早就加入到了中华文明体的构建队列之中，更不必谈及七世纪之后开始的两地血亲以及吐蕃建设河西广大地区的桩桩件件；而同时，西藏及当下的相关争议地区与有非分期许的国家并无深切关联，不仅地理条件和人文表达不予支持，连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等文献经典也不予支撑。这既是自知的原因，也是知彼的结果，是建立于域外他方错误关切和非法期许基础之上的自然探索，更是知己知彼的必然结论。所以，如果我们在拥有域外相关方的认知逻辑、行事规范、宗教伦理等知识的前提下，宣传和实践并进，付诸相关呼吁及行动，也许效果会更好。因为，我们已然知彼，一是能大致估计到对方的反应，二是我们必须有相关言行，这个时候，自然不必呼吁他方相向而行；或者说，无论他方是否相向而行，我方胸中自有丘壑。

这便是笔者主张的知彼而行，与期待他方相向而行不同，这类知彼而行是主动的，其中的“行”是我方发出的，是不依赖于事后态势的；而相向而行中的“行”是他方发出的，发不发出是不依赖于我方

意志的，完全由他方决定。相较于理想状态下的相向而行，笔者认为，知彼而行是一种更加务实理性的定位，应该成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者出于全球视野、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前提之下的追求。

（责任编辑：段九州）